

论庄子言说方式的道德性问题

谭维智

(山东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西方元分析伦理学把语言视为道德判断的基础,斯蒂文森把道德语言称为劝说性语言,黑尔认为道德语言是一种规定语言,他们试图从语言活动的角度,从表述方式上论证道德判断、解决伦理争执的方法。道家的庄子认为道德问题是无法通过语言进行讨论的,道德学习也不能通过言说进行,道德语言不应该是劝说性的。道德说教的包含的不道德问题是在言说中存在普遍的自负与固执己见,这是伦理争执产生的根源。道德语言也不应该是一种规定性语言。真正的道德语言是非言非默的无心之言,一方面不能从个人偏私出发,一方面不可以对已说之言固执、自负。

关键词 言说方式 道德性 道德教育 庄子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40(2011)07-0027-04

道德语言是当代西方伦理学投入极大热情的主题。分析元伦理学认为,道德判断本质上是一种言语行为,是对道德词语的使用,因此通过话语分析和对道德词语的意义的探究,能够深入洞察道德分歧的本质所在。C·L·斯蒂文森把道德语言称为“劝说性语言”。在现实道德情境中,说者总是有目的使用语言,即能动地使用词语,目的是诱发对方赞同的倾向,以此来说服、劝导对方,改变对方的道德态度。黑尔认为“道德语言是一种规定语言”,并把规定语言作为道德判断的基础。其根本特性就在于建议、劝告、指导、规定人的选择和决定。维特根斯坦在早期坚持“伦理是不可说的”,“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后期他提出“语言游戏说”,把语言比作工具,“语言是一种工具,它的各种概念是各种工具。”他们虽然持有不同的主张,但在通过语言问题讨论伦理问题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道德与语言关系问题的实质,是从语言活动的角度,从表述方式上论证道德判断、解决伦理争执的方法。道家的庄子对道德问题认识的深刻之处在于一直深入到反抗语言表达所蕴含的非道德因素和人们习以为常的道德判断方式,在庄子那里,道一方面表现为不可知,一方面表现为不可言。由道不可知,庄子新辟了独特的道德经验方式,由道不可言,庄子尝试了道德的言说方式。

一、道德具有不可以言说的特性

在庄子的理论体系中,“道”是不能或无须由逻辑推理和实验论证的,它本质上是一种对自然规律的感悟,是超然于知识之上的智慧。德是由道而来的,因此,对道的感悟也就包含了对道德的感悟。语言由于其自身局限无法有效传递道德感,“言而非也”。庄子在《知北游》篇写了泰清向无穷问道,无穷说不知道,究其原因,除了规避知识论的解决方式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话说局限性的认识,无穷正是认识到了道感的无法言说

才拒绝回答泰清的提问。对此,庄子认为“说不知道的人真正知道道的内涵,而说知道的人只是了解道的外表。道无法听到、无法看见、无法言传,能听到、看见、言传的就不是道了。要知道产生有形的道德行为的道是没有形体的,道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①说道不可言,庄子实际上是在强调道德教育是在一种言说对象高度模糊状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这种状态下,道德教育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面对道德教育所传达的主张以及传达主张过程中采用的方法,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存疑才对。

这是道德教育面临的一个难题。在探讨道德问题的过程中,如果教育者见到有人问道德问题就给予确切的回答,他其实是不懂得道德,而询问道德问题的人,也无法从他那里听到对道德问题的真正解答。道德问题本身是不可询问的,询问了也无法回答。无法回答却一定要去询问,这种询问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询问。无法回答却还要勉强去回答,这种回答就是一种毫无内容的回答。拿毫无内容的回答去应对毫无意义的询问,这样的人,是不明白道德问题的微妙,还远远未能达到透彻理解道德问题的境界。^②道德问题是无法通过语言进行讨论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人类讨论道德问题几千年了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的原因。

那些认为道德可以传达、传授的人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知道什么是道德。所以,庄子认为无法把道德的观念教给一个人,道德不像自然知识那样可以通过语言进行传授。道德境界不可以拿来奉献、赠送、告诉、给与,你无法把它送给或者告诉君王、双亲、兄弟或子孙。因为教育还要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对受教育者而言,外界的影响如果不符合心中的主意则无法取得共鸣,即使教他东西也无法留在心上。站在教育者的立场看,教育对象没有纯正的品质,与道德格格不入,你想对他推行道德,他也不会接受。教育者传授道德要看对象,对象不接受就不传;受教育者要看教育内容,如果他人传授的东西与自己心中主意

①《知北游》不知深矣,知之浅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无形乎!道不当名。

②《知北游》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虽问道者,亦未闻道。道无问,问无应。无问问之,是问穷也;无应应之,是无内也。以无内待问穷,若是者,外不观乎宇宙,内不知乎大初。是以不过乎昆仑,不游乎太虚。

收稿日期 2011-06-16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课题“道德教育的减法原理及其运用研究”(课题批准号 3BA09009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谭维智,教育部山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讲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哲学、道德教育。

不符合,也不会把它放在心上。①

除了道德本身的原因以外,道德不可言说的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在于语言本身的局限性。语言只能表达有形世界里较粗显的部分,不能表达较精微的部分,更不能表达无形的超验的事物。②这实际上是一个言意关系的问题。在《天道》篇,庄子说到“言不尽意”的问题,他说,世上人们所看重的和所称道的就是书,书不过是些语言而已,语言不是没有可贵之处,语言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所表达的内容,而内容则来自写书人的思想情感,然而写书人的思想情感的精妙部分,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世人因为看重语言而传授书籍,我还是认为不值得看重,因为世人所看重的并不是真正值得看重的。可以用眼睛看得见的,是对方的形体和表情,可以用耳朵听得见的,是对方的名号和声音,世人都认为可以通过观察形体表情和名号声音就可以了解对方的真实思想感情,实际上根据形体表情和名号声音是无法了解对方的真实思想感情的,真正懂得大道的人是不会用语言去描述大道的,那些侃侃而谈的人并不懂得大道。③心中之意是无法用语言完全表达清楚的,一个人要想了解另一个人,他看到、听到的只是这个人的表情、动作和声音,一般人认为只要通过动作和声音就可以知道对方的内心情感,而庄子认为这种所谓的“知道”是不准确的。轮扁以自己砍削车轮来说明语言表达的局限性,他说自己砍削车轮动作太慢了车轮就松散而不坚固,动作太快了车轮就滞涩而难以入木,他自己现在是不快不慢,得心应手,对砍车轮的这种体验,用语言虽然表达不清,但确实有一种技巧存在其中。他无法把这种技巧明白地告诉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也无法从他这里学到这一技巧,所以他七十岁了还要在这里砍制车轮。④这是语言表达局限性的一个典型案例。

语言的出现为人类的信息交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语言在人类生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语言在揭示客观事物、人类情感的同时,又在无意中掩盖了一部分事物和情感的真相。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是由于表达内容的局限,也是由于语言本身存在的缺陷。在很多情况下,语言无法完全、彻底地描述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细节。人的道德感,更是非常微妙,其精妙的感觉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对道德的理解,只有通过实践,有了亲身的体验才会真正理解,体验的深度决定了理解的深度。道德可以传授,但是不像给人东西那样,可以直接给你,是仅仅给你一种观念。道德教育所能做的不过是教师把他的经验告诉学生,学生依照教师的经验去做,产生属于自己的体验。学生所体验的道德,是他自身通过体验形成的,不是教师给他的。教师传授的是经验,是一套社会文化价值观,而不是道德本身。道德需要自己去体验,仅仅获得一种书面经验,还不是道德。⑤因此,人们无法把道德教给自身之外的其他人,也无法让其他人明白自己所感受的道德究竟是什么,对道德问题侃侃而谈的人往往是不懂得道德的人。

庄子“道不可言”的主张是与“道不可闻”、“道不可见”、“道不

当名”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道不当名”,不是一种可以用概念表达的知识,所以对道的“言说”就受到局限。因为“道不可见”,所以就无法以具体的形式加以传授。因为“道不可闻”,所以也限制了受教育者对道德“言说”的接受。⑥这几点是互为因果的。归结到道德教育上,就是直接体现为一个问题,即道德不可言教。

二、道德说教的无效性

庄子的对道德说教的无效性的论证主要是从受教育者和教育者的不同视角展开的。从教育者的角度,庄子认为道德是不可能靠语言来说明、论辩的。首先道德是无法用语言说清楚的。如果拿逻辑观念来推理的话,论辩到最后,是无言之辩。这主要是因为用语言说出来的道德就不是真正的道德,用语言对道德进行争辩,总有辩论所达不到的地方,只在语言上去辩论,以表示自己见解高明,反而是远离了道德。真正的道德是不可能说清楚的,真正明白了道德原理的人就会放弃道德说教。其次,说出来的道德已经不是真正的道德,具体到道德内容上看,口头上的仁和善都不是真正的仁和善。真正的仁爱、廉洁、勇敢,用不着用语言标榜自己。⑦在庄子看来,道德是人的智慧所不能知道的东西,而智慧所不能知道的东西,语言也就无法将它描述出来。道德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言说要停止于不能言说的内容。庄子以良犬为喻来论证不言优于言说的地方,狗不能因为善于吠叫就成为良犬,同样人也不能因为善于说教就成为有道德的人。⑧所以真正懂得道德的人,会放弃任何知识、思想的言说和辩论,真正的道德到了最高处是不言之辩,没有理论、没有语言可讲。当然也就不会有拿着自己的道德主张针对别人的道德说教。

庄子列举了两种类型的教育者。一种是不具备真正的道德只会说教的教育者,一种是真正有道德的教育者。只会说教的教育者没有真正的德性却有世俗的道德知识,他们从来不约束自己做到清静恬淡实现真正的美德,而是凭着自己的道德知识与人周旋,用言说的方式表现、掩饰自己的德性,给人以有德之人的假象。庄子认为这样做不仅不能从道德上帮助别人,反而会使他人丧失美德。真正有德的教育者完全以清静无为的态度去对待他人,从来不进行道德说教,却可以把美德传给他人,这样的教育者与世人一起生活而使世人受到感化,犹如父亲对子女的影响一样。⑨以说教的方式来教育别人的教育者之所以采取说教的方式,主要是因为他本身并不具备美德,无法让别人从他的行动上获得感悟,因此只能以言说来教别人如何做。真正的有德者由于自身具备了美德,自己的行为本身就是对受教育者的一种启示、激励,因此不需要通过说教,而受教育者自然可以从他身上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受教育者的角度来看,道德学习也不能通过言说进行。语言的可贵之处在于表达思想感情,但人的道德感情却是无法

①《天运》: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它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圣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于中,圣人不隐。

②《秋水》:河伯曰:“世之议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围。’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郛,大之殷也。故异便。此势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③《天道》: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④《天道》:斲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

⑤《大宗师》: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⑥《知北游》: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无形乎!道不当名。

⑦《齐物论》: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谦,大勇不伐。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圆而几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

⑧《徐无鬼》:仲尼之楚,……曰:“丘也闻不言之言矣,未之尝言,于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孙叔敖甘寝乘羽而郢人投兵,近愿有喙三尺。”彼之谓不道之道,此之谓不言之辩。故德总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辩不能举也。……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而况为大乎!夫为大不足以为大,而况为德乎!

⑨《则阳》:夫夷节之为人也,无德而有知,不自许,以之神其交,固颠冥乎富贵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故圣人其穷也,使家人忘其贫;其达也,使王公忘爵禄而化卑;其于物也,与之为娱矣;其于人也,乐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入化,父子之宜。彼其乎归居,而一闲其所施。

用语言来表达的。人们可以看到、可以听到的是言说者的形体、表情、声音、名号,真正的道德是看不见、听不到的。道德的实质精微玄妙,无法言传,因此从“形色名声”中无法得到道德。无法通过这些来理解言说者所表达的道德感情。^①这样,通过语言进行道德学习的效果必然是极其有限的。了解到这种局限,真正懂得道德是什么的人是不会用语言去言说道德的,而那些侃侃而谈对人进行道德说教的人都是不懂得道德是什么的人。

庄子以颜渊跟随孔子学习道德为例证明了通过接受说教并不能学习道德的问题,颜渊亦步亦趋跟随老师学习他所传达的道德,听从孔子的道德说教,与孔子一起论辩、谈论道德问题,但是终究还不能达到不用言说就取信于人、不用表示亲近、不用显示权势就吸引人的程度,不能达到道德的最高境界。究其原因,是由于在道德论辩的过程中,人只能了解言说者显示在外的言行,但是这些言行是非常容易消失的东西,受教育者通过言说接受教育,他必然把这些言行当作一种现实存在的东西,只注意言说的外表,而忽视了道德本身,这种做法就好像在空荡荡的市场上去找马一样,只注意了外在的形式而忽视了实质的内容,是不会成功的。^②言说、论辩只是教育形式,并不是具体的教育内容。甚至可以说言说只是空洞的形式,根本不包含任何实质性的内容。但是,现实中人们往往只注意了教育形式,而忽略了具体的道德内涵。在道德教育上若要达到成功,需要舍弃形式,做到不言,甚至忘言,不去听所谓的道德说教,把注意力集中到对道德内涵的体悟之上。因此,庄子对受教育者的建议就是“不要听别人谈论道德。越是说得清楚的思想见解越是不符合大道,对道德问题的巧言善辩,反而不如闭口不言。道德是不可能通过听别人说就可以获得的,听到别人谈论道德时,还不如赶快塞住自己的耳朵。这样就可以说是真正懂得道德的奥秘了。”^③

总之,道德说教的局限是双向的,一方面是无法通过语言传递道德,另一方面也无法通过听别人的言传获得道德。在道德教育中不言具有比言说更好的效果。

三、道德说教中包含的非道德因素

在《知北游》中,庄子说道不可言不仅仅是语言能力不够的问题,因为即使用语言相当准确地说出什么是道,道在本质上仍然是不可言的。^④说的再好也不行,因为确信道可以言说这个态度本身就背离了道。^⑤在言说的过程中,语言表述中通常会有确定与自负的态度,才是要害。正是某种确定性妨碍了其他可能性的发生。问题在于,语言的态度和道的态度形成了某种冲突。语言的特点是从单一角度表达某种确定性的知识和意图。道德的态度本质上就是谦虚与变化,准备接受新的角度以拓广精神的视野,体道者不能把任何既有的理解凝固为最终的真理,当然也不能用确定不疑的态度来说言说既有的理解,因此无言比准确的言更接近道德的本质。^⑥所以说道所包含的态度与语言所包含的态度有本质上的差异。

语言的核心问题是在言说中存在普遍的自负,问题的关键还不是表达能力有限,而是在有限的言说中偏要自以为是。这样一来,对语言的认识,就把“道不可言”由能力问题转变成了

生活态度问题,成了一个伦理问题。庄子在《齐物论》中有一段话:“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这是一个从言说方式上避免确定性问题的方法。而道德问题上的争执多易陷于确定性的误区。这话的意思是说,以我来衡量他,不如以他来衡量我,由于争执的发生,常是从“我”这一方去断言,常是出于自我中心的观点,如能从他方来看,许多争论也就不至于发生,因而在观点上不至于自我执著。

《齐物论》篇多处从伦理的角度考察语言问题。其大意为,现实世界的语言是在自我中心的生活情境中培育起来的,其典型特征就是表达一种确定意见。表达确定意见是从自己特定的立场出发,结果就是自以为是,以他人为非,并且用虚浮的辞藻来夸饰加深这种自我中心的是非。用庄子的话就是“师其成心”,“成心”就是偏好之心,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偏好之心,而语言就是对成心的确定化的表达。^⑦在语言的世界里,人与人相互争辩不休无止,实质是捍卫某种偏私立场上的片面之见,结果形成纷乱的争嚷。^⑧师其成心的偏私立场,使人人都把一种暂时性的偶见夸张为确定不疑的知识。语言就是这种确定态度的表达。更坏的是,语言不仅把自我中心的偏见确定化,而且加上许多文饰的花样,成为人们自鸣得意的工具。

因此,庄子对语言的不信任,不只是对语言的表述能力的不信任,而且是对人们表达语言的根本态度和作用的不信任。语言实际上是使人类深陷于分裂境地的一个重要原因,语言的基础是“成心”,更加偏执,因此语言的作用是助长了人生状态的分裂。庄子因此以大自然中甚为微不足道的幼鸟的叫声比照人言,人在苍茫纷扰的世界里,用细弱的声音发出自己的独特感觉和愿望,与鸟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⑨在庄子看来,人们所谈论的内容无非是客观的事物或思想,而这些客观事物和思想瞬息万变,当谈论者描述这些事物和思想时,这些事物和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谈论的内容就是虚假的,说了等于没说。每个人都从自己的成心出发发出意见,大家出自各自的成心,彼此不接受对方的意见,那么,人言在本质上的偶然性与鸟叫有什么区别?在这里庄子没有从语言的交流、传递信息的一般功能来考察语言现象,而是从伦理的角度考察语言现象,把语言的自负、语言的霸权作为人的生存病症的一部分。

由于怀有世俗的目的或者私心,一个人懂得什么是道德容易,但是懂得道德而不去表现、不去对人说教则是很难做到的。^⑩懂得道德知识但是不去对人说教,这是通向道德的自然境界的途径,是明白自然规律的人采取的方法,懂得了道德知识就去对人说教,这是通向世俗社会的途径,是想以说教实现个人私欲的人采取的方法。由于世俗社会的物质诱惑,以及人本身强烈的表现欲,人很难不去宣扬、表现自己所知道的道德知识。也就是说,说教者的道德说教往往并不是为了受教育者的利益,而只是为了一己之私利。道德说教本身并不是为了道德,而是有其他的目的。

从这些认识出发,庄子主张“去言”,认为去掉言说保持不言才是最高的道德境界。他分析古时候那些有德之人,他们的外表言行随机应变,而内心却能保持真正的道德状态,现今的人内心变化无常,已经失去了道德状态,但是言行却固执不化,

①天道：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②《田子方》：颜渊问于仲尼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趋亦趋也，夫子辩亦辩也；夫子驰亦驰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无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恶！可不察与！……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尽矣，而女求之以以为有，是求马于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甚忘。虽然，女奚患焉！虽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③《知北游》：彼至则不论，论则不至。明见无值，辩不若默。道不可闻，闻不若塞。此之谓大得。

④《知北游》：彼无为谓真是也，狂屈似之，我与汝终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

⑤《知北游》：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无形乎！道不当名。

⑥《列御寇》：庄子曰：“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⑦《齐物论》：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

⑧《齐物论》：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⑨《齐物论》：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鼂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

⑩《列御寇》：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不能顺物而变。^①总是固执于某些道德理论、主张,固执于道德说教恰恰是没有道德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那些固执于道德说教的人,已经没有真正的道德而只有千篇一律的用于说教的所谓道德知识。真正具有道德的人都不去进行道德说教,那么没有道德的人还在那里说什么呢?真正有道德的人不去谈论道德,而谈论道德的人并不真正懂得道德,所以圣人施行没有说教的教育方式。^②《田子方》篇中魏文侯听田子方谈其老师的高德以后终日自失不语,^③孔子见到老聃的样子是“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乎独也”,老聃“不能言”;《知北游》中“无为谓”的一言不发,“无穷”对泰清的问道答以“吾不知”,这都与狂屈所谓“中欲而言而忘其所欲言”是一样的,都是一种对自负态度的自觉规避。老聃后来向孔子描述了“物之初”,但他首先是感觉“不能言”,后来又“尝试为你说其大概”,^④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常规言说中那种自负的态度。

四、非言非默的道德言说方式

庄子认为正确的对待言说的态度,应该是把它当作工具、桥梁,通过它把握道。人们就应该象过河拆桥那样,得鱼忘筌,得意忘言。^⑤语言好比一个路标,在这个路标的指引下,行人可以到达自己的目的地。这个路标是不可或缺的,但必须明白,路标并不等于目的地。要善于从语言所设置的陷阱或迷宫里跳出来。《大宗师》篇说到女偶介绍得道的方法,共分九个步骤:副墨之子-洛诵之孙-瞻明-聂许-需役-于诤-玄冥-参寥-疑始,九个步骤层层推进,是一个从文字、语言、眼睛所见、耳朵所闻一直到最根本的境界的从外到内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对言说的超越和舍弃的过程。道德教育无法绝对回避语言,要从文字入手,但不能满足于文字的世界,也不能停滞于语言的世界,也不能仅仅止步于眼睛、耳朵的世界,还要超越外在的、有形的世界,最终进入一个更内在的世界。^⑥你不能把语言当真,你不在乎它的方式就是你游戏语言、超越语言。

本来“道不可言”,沉默应是唯一选择,可是绝对的沉默又回避了实存世界,不是真正得道者的态度。所以绝对的沉默也不对。因此,庄子提出了如何言道的原则:大道是万物的最高规律,无论是用谈论的方式,还是用沉默的方式,都无法表述它,而非言非默、似言似默的方式,才是一种最高境界的谈论方式。^⑦意思是说,单纯相信言说和单纯相信沉默都不对,应该以一种不同于日常言说的态度来言。“道不可言”只是说不可以把任何具体的见解确定化、凝固化,沉默的优势就在于对言的自负给出一种特有的警告。可是沉默如果成为绝对,那就意味着万象纷纭的世界成为死寂,意味着“有”的任何形式中都没有值得留意之处。所以以“非言非默”打破沉默的绝对化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庄子主张有一种可以与道相通的言说。

这种言说方式就是“忘言”之言。^⑧是说过以后就忘,不固执于自己所说的话。以不在乎的方式去说。这正是对日常语言的不自觉的自负态度的瓦解。庄子要人忘言,是要人不固执已说过的话,不固执以确定形式表述出来的意见。忘言之人是谦虚之人,是意识到自己从有限立场获得的见解不可能穷尽真理的人,因此他一方面以言说表达自己的意思,一方面不固执已经

说出的话,即非言非默。忘言的实质是破除言说中通常固有的固执与自负,使言说变成一种谦虚的意义交流。因此庄子的说话从来不是独断式的,从来都是疑问式的,或者是或然式的,或者是暧昧式的,他不确认什么东西。

在《则阳》篇,庄子还提出一种“无心之言”,这种无心之言并不是没有见解想法的随意乱说,而是指不把见解确定化,不肯定所说的意见是确定的东西,也就是不以成心为本。言而无心,即是虽有言而不师其成心,意近于尝试;言而无言,即是虽有言而不固执,意近于探讨。这种言,就是道的表述语言,是一种道德语言。庄子提出的这种道德语言,当然意在表达见解,但表达见解不能从自我中心出发,一方面是不能从个人偏私出发,一方面是不可以对已说之言自负。言说者决不把任何表达视为私产,而是随时准备倾听别人,更新见解,这就与外部世界建立了一种非自我中心的道德关系。

庄子的道德语言不同于斯蒂文森的道德语言,也不同于黑尔的道德语言,庄子的道德语言,更多是从言说的内容而不是从自我中心出发、态度上不自负于所言说的内容来讲的,斯蒂文森则是把道德语言视为人的情感、欲望和态度的纯情绪表达,认为伦理学判断的作用是表达说话者的情感态度,唤起听话者相应的情感态度。这恰恰是庄子所反对的,在庄子的观点中,言说者所试图传达的这种情感态度是其他人无法理解的,言说的结果只能是徒劳的。黑尔的道德语言,主要是从语言的规定性来说的,它的道德语言既陈述事实,也规定或引导人的行为,指导人们做出各种行为选择和原则决定;庄子的道德语言反对的是这种规定和既定,特别是语言的规定性,庄子反对固执于某个特定立场,把由此立场而得的知识见解固定化并自负高明,在语言风格上,庄子行文跳跃性很大,经常从一个视角跳到另一个视角,从一个思路跳到另一个思路,这种跳跃风格,是庄子不肯固执于任何确定立场的主张的一种反应,或者说,也就是没有任何的规定性。这是与黑尔的道德语言截然相反的一种道德语言。在某些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庄子与维特根斯坦更加接近,庄子同维特根斯坦一样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工具、一种游戏,早期的维特根斯坦主张“伦理不可说”,这与庄子的“道不可言”有接近之处,维特根斯坦用逻辑原子主义世界观对“上帝”、“善”、“美”这些名称进行意义分析之后发现,它们根本不存在,也不能被分析为存在的命题,它们被划入了神秘世界,这是不可说,只能呈现的世界。这与庄子是类似的。庄子和维特根斯坦向我们昭示:伦理世界是非科学的世界,诸如“绝对的善和绝对的价值”之类的概念都是科学的方法误用于伦理学所致。人的意志规律是非逻辑的,我们应该跳出逻辑世界,反观人生。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主张语言的游戏说,出发点与庄子接近,但是二者得出的结论则有很大差异,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功能的多样性,反对探寻词语的意义,只要探究用法,即“意义即使用”,从而开启了语言的“语用学转向”。庄子不像维特根斯坦那样耽于语言的使用,而是反思语言使用过程中所包含的非道德性因素,因此主张不拘泥于、固执于语言的使用,用了之后要放弃、甚至要忘记对语言的使用,以此去除语言使用过程中的非道德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庄子提出的非言非默的道德语言以及他对语言使用过程的反思,不啻为西方伦理语言使用研究的一剂清凉剂。

①《知北游》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与之相靡?必与之莫多。……至言去言,至为去为。齐知之,所知则浅矣!

②《知北游》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

③《田子方》远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圣知之言、仁义之行为至矣。吾闻子方之师,吾形解而不欲动,口钳而不欲言。吾所学者,直土埂耳!夫魏真为我累耳!

④《田子方》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尝为汝议乎其将……

⑤《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⑥《大宗师》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聂许,聂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于诤,于诤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

⑦《则阳》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

⑧《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